

教育伦理实践效益的反思与优化

■ 糜海波

摘要:作为一种教育实践精神,教育伦理对教育活动把握的效果如何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对教育伦理实践效益的思考旨在关注教育伦理实践由价值目标到实际效应的转化。当前教育道德的理想追求与现实表现之间的脱节,主要体现于功利主义教育甚嚣尘上、精英主义教育依然盛行、人文主义教育渐趋式微。因此,必须确立教育崇善的道德律令,增强教育的物质投入,加强教育伦理规范建设,优化和提升教育伦理的实践效益,使教育的道德实然自觉地向教育的道德应然状态切近。

关键词:教育伦理;实践效益;反思;优化;教育善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33X(2009)10-0008-04

作为一项杰出的道德事业,“教育是人和人灵魂上的最微妙的相互接触”^{〔1〕}。从教育思想到教育制度,从教育目标到教育过程,教育系统的实践都应合乎先进的教育伦理规范,体现先进的教育道德理念和教育伦理精神。然而,关于教育道德调整教育的实际状态,即教育伦理在教育实践运行中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却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这不能不说是教育伦理研究中的一个缺陷。因之,提出教育伦理实践效益的问题,关注教育道德调整教育的实际状况和结果与教育道德理想之间的内在关联,无论就理论本身而言还是就我国当前的教育伦理建设而言,均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现实课题。本文拟就教育伦理实践效益的理论依据、现状及优化路径等几方面作一分析和探讨,以引起学界对此课题的深入研究。

一、提出教育伦理实践效益的依据

对教育伦理实践效益的思考是关注教育伦理实践由价值目标到实际效果的转化,即一种教育伦理体系由形而上的理论预设向教育德性的生成从而达到应有的价值实现。如果教育伦理之应然不能在教育生活中转换成有效的实然,教育伦理就会形同虚设或成为玄思,教育也就无法完成社会对教育至善的价值期待。就此而言,在我国较为发达的传统道德教育及其影响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历史学根据。

在中国教育历史上,教育伦理思想的基本主题是对教育目的的价值评价,主张教育的首要旨趣不在于传授知识,而在于培养圣人、贤人和君子,即造就道德人格上达到完美境界的人。以德性的养成和最高成就为教育的根本目标决定了中国传统教育的功能在于“教人伦”、“明人伦”,教育的内容则是长期居于意识形态地位的儒家道德文化。因之,中国传统的教育与道德浑然一体,共同服务于封建国家的延续。一方面,教育以儒家伦理为主要内容,这种道德在教育中不仅有明确的价值目标,而且十分注重这种价值目标的现实转化,这体现在它尤为注重通过外在的教化激励道德主体的自省自律,进而转化为道德主体的道德信

念和道德行为;另一方面,在道德教育过程中,中国传统社会还十分注重道德目标和实效之间的相互校正和相互适应,这突出体现为儒家的道德教育自觉根据历史发展的要求不断调整改造自身,并最终达臻精致、完备的地步。通过上述努力,传统教育及道德较好地实现了服务于社会的使命,与之相适应,社会对传统教育、道德的认同接纳又对其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以儒家伦理为主体的传统道德之所以在漫长的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契合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现实,注重道德教育的实际效果,从而形成了道德教育的内容和形式与社会宏观系统之间相互协调、彼此促进的互动机制。中国传统教育伦理非常注重道德教育的实际状况和价值目标的契合,这一历史经验启示我们,有必要提出教育伦理建设的效益性思考,从而使教育伦理建设无论对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而言都能不辱时代使命,使其价值和功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应有的升华。

然而,尽管我国的教育伦理学科自改革开放后获得了长足发展,在教育伦理的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研究主题、中外教育伦理思想史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目前的研究视阈仍大多停留在教育伦理的理论层面上,而对教育道德介入教育生活的实践层面产生的教育道德效应着墨不多,对教育道德理想与教育生活之内在关联的实证研究明显不足。这主要体现在:一是源于并高于现实的教育道德目标尚未得以科学的确立。教育的个体本位与社会本位之争,教育评价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辩,我国的“政治人”、“经济人”与“全面发展的人”的培养目标的轮番较量无不印证了这一点。二是对实然——教育道德的现状把握失准。譬如教育界对教育道德存在的诸多困惑与疑虑,乃至全社会关于当代教育的道德水准是在“爬坡”还是“滑坡”之担忧再清楚不过地显示了这一状况。三是对所设定的教育伦理原则规范如何转化为教育者、教育主管部门的自觉追求尚无深入研究,未能在方法论和工具性层面上研究这种转换的现实途径,而且尚未形成一套考察教育道德理想转化为教育实际效果

作者简介:糜海波(1969-),男,江苏南京人,南京森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系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教育伦理学研究。

的价值评价体系。对教育伦理建设效益研究的明显阙如,要求我们对上述问题从学理上作进一步的理性反思。

教育伦理作为应用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以“实践—精神”的方式把握教育世界的,它更应关注教育道德在现实教育中的实践意义,关注教育道德介入教育的实际效果如何。由于教育伦理体现的是一种应然价值的存在形态,向人们昭示的是“应该如何”,也是以教育实践为价值客体促使教育道德理想的实现。因之,教育道德在教育活动中决不是孤立、封闭而是开放的存在,不是静态而是动态的存在。在教育道德运行的过程中,不管人们是否自觉意识到,教育道德总是有其运行目标并总是围绕其目标展开的。正如马克思在谈及劳动时曾指出:“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2〕}作为人的活动的劳动过程是这样,以教育道德理想的实现为目的的教育道德运行也具有同样的原理。这样,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仅就最一般的定性研究意义上说,我们完全可以从教育道德理想的实现、教育道德的运行过程中发现并划出一条中轴线,这条中轴线就是教育道德启动之初教育的基本道德状况和当时社会客观上实际需要达到的基本教育道德目标之间的连接线。也即是说,教育道德运行过程中的中轴线是由既存教育道德状况和基本运行目标两个因素决定的。但是,在教育实践中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传统以及教育本身的复杂多变,教育者的情感、动机、行为及社会发展的某些不可控性,加上教育道德作用的客体及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教育道德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作用与其总体目标往往发生某种偏离乃至相悖,从而表现为教育的道德虽然同教育的道德应然不尽吻合甚至背离。这就说明“教育道德的实际运行过程、运行轨迹并非一条绝对的直线,而是以曲线形式存在的”^{〔3〕}。而教育实践中的物化教育、商化教育、异化教育、应试教育等违背教育规律现象的存在,无形中成了加剧教育道德运行曲线偏离中轴线的负面发动机。因此,要想实现教育行为的最大合理性和有益性,就必须关注教育道德曲线的每一点,必须最大限度地实现教育道德运行的实际状况与教育道德理想之间的重合程度,即教育伦理建设的效益性。

可见,教育伦理的实践效益是教育伦理研究中客观存在的范畴。鉴于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时下人们关于教育的种种道德诘难,实际上反映了教育道德的运行状况有悖于社会发展对教育的价值期待,而这正表露了人们对教育道德运行正效应的深切呼唤。

二、当前教育伦理实践效益的式微

教育作为人类特有的社会实践活动,与人类其他实践活动一样,具有目的性、自觉性和能动性。教育存在的价值合理性与合法性根据在于,教育能够依据人与社会发展的自身规律,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以及培育特定社会所需要的适用人才。教育活动的这两个基本目标是教育具有合道德性的内在规定,也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科学理论的价值指向。前者体现了教育以人为本的精神,后者体现了教育以社会为本的原则,究竟谁构成现代教育的本质和使命,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见解。笔者认为,教育

在其伦理意义上必须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相互协调的平衡点,因为教育的特殊使命在于育人成才,育人就是促进人的解放和发展,成才就是满足社会的需求。但是如果教育阉割了“全面发展”的应然目标,一味迎合社会需要,这样教育培养的人才就是残缺的、单一的、无活力的。受教育者在这种教育氛围下失去的是自身兴趣和潜能的挖掘,他们仅仅成为商品化的产品被教育这个特殊机器所生产。我国有学者指出,“许多学生都反映过这种教育的无聊与缺乏生气”^{〔4〕}。学习因此成为学生的一种负担、一种人生最大的压力。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曾经就升学教育对学生的全面性损害提出过严厉的批评。他认为,学生在应试和灌输教育中体验的是“以智害德”、“以智害体”、“以题害智”。教育在培养人的招牌下却在摧残人、扭曲人性,教育的伦理生态在生存哲学的理路上呈现出的是不和谐图景,受教育者的知识与智慧、人格与能力、理性与感性发生了偏离。教育伦理生态蕴涵的张力由此失衡。我国教育道德的理想追求与现实表现之间的这种脱节,可以从以下方面略窥一斑:

首先,功利主义教育甚嚣尘上。所谓功利主义教育是指一种以眼前利益的获取为价值取向的教育理念。其典型表现是把人作为工具来培养,完全无视教育在提升人性方面的价值,以至于认为如果教育不能让人发挥立竿见影的功效,不能使国家强大,这种教育又有何用?大众教育时常面临这种尴尬的质疑。教育进而成为获利的手段而不是体验幸福和自由的存在方式。对此诺贝尔奖得主艾略特这样评价现代教育:“个人要求更高的教育不是为了智慧,而是为了维持下去,国家要求更多的教育,是为了要胜过其他国家;一个阶层要求更多的教育,是为了要胜过其他阶层,或者至少不被其他阶层所胜过。因此教育一方面同技术效力相联系,另一方面同国家地位的提高相联系。要不是教育意味着更多的金钱,或更大的支配人的权利,或更多的社会地位,或至少一份体面的工作,那么费心获得教育的人便会寥寥无几了。”^{〔5〕}可见,市场经济条件下功利主义教育思想的蔓延与渗透,带来的是教育的表面繁荣,教育伦理特性的丧失,它不能使教育善、教育德性和教育的完整意义得以理想地实现和展开。

其次,精英主义教育依然盛行。精英主义教育是一种认为教育主要应以培养少数英才为唯一目的的教育理念,它其实是通过学校教育的分层进而导致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的源头。回顾西方教育史,“从希腊时代起,培养贵族化的人才就一直是教育的主要方向”^{〔6〕}。而中国的传统教育则从来就是一种精英教育,这种教育体制的出现主要是源于圣人统治说。在高等教育迈向大众化的今天,我国教育中的精英主义色彩并没有随着社会的变迁从人们的心理淡出。目前,我国的一切优质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为精英和社会富裕阶层准备的。只有成为精英才能享受本该属于每个学生的资源。显然,精英主义教育体现了一种教育的不平等、不公平,它使优者更优、弱者更弱,由于只关注少数可能成为“精英”的学生,而冷落了大多数学生,使后者处于发展的不利地位。固然,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需要大批精英,但培养精英人才不能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对教育伦理实践效益的关注有利于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而不应仅仅是

聚焦专家群体的形成。

再次,人文主义教育渐趋式微。教育的人文主义以人的和谐发展为目标,希望人的本性、尊严、价值和潜能在教育影响后得到最大的实现和发展。然而,源自古希腊、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精神,到今天不是发展了而是断裂落伍了。特别是19世纪英国教育家斯宾塞提出著名命题“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一致的答案是科学”以后^[7],科学主义教育便横扫教育的各个领域,而近代以来科技革命的成功则使人们更加推崇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当前这种状况随着知识经济的端倪在我国表现得淋漓尽致,整个教育明显存在着重智育轻德育、重实用轻思维、重知识传授轻人格培养的倾向,教育的运行过程普遍染上了实用唯学、急用先学、急功近利、热蒸现卖的通病,这就使以完善人性、净化心灵、提升人格为目的的人文教育遭到了空前冷落。事实上,人文与科学是确证生命本质力量的两翼,一旦失调,社会和人类都会失衡。所以犹太人会将将有知识而没有智慧尤其是缺少道德智慧的人视为“背着很多书的驴子”。

因此,对当代中国教育伦理实践效益的反思,不仅是对教育者教育行为进行价值导向和道德规约的实际考量,它更需要引起全社会对教育改革走向的道德省察和伦理检思。在教育迈向市场化、社会化和全球化的今天,我们确实需要避免西方国家走过的因步入工业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泥沼而使教育人文性与科学性相分离的歧途。教育需要减少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功利主义、精英主义和科学主义倾向的冲击,使教育真正成为全面发展的事业而不是沦为制造物质的工具,使受教育者在教育中感受到意义的充盈和生活的完满而不是成为填充知识的容器和失去创造思想的机器。

三、优化教育伦理实践效益的路径依赖

优化教育伦理的实践效益旨在通过教育主体的中介使教育行动之应然转化为教育行动之实然。前者是指对教育活动的一种善的规定,后者指的是教育在道德上实际是否为善及其表现如何。一般而言,作为事物的现实表现样态的实然总是与其应然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脱节或悖离,而作为事物客观存在本性及其理性要求的应然对实然就表现出必然的超越性、引导性和规范性。优化教育伦理的实践效益正是为了不断缩短两者的距离,使教育的道德实然自觉地向教育的道德应然状态切近,从而逐渐实现教育道德实然与应然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为此,选择以下路径作出努力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确立教育崇善的道德律令,为优化教育伦理实践效益提供内在保证。善恶是客观存在的一对矛盾范畴,善恶斗争贯穿于人类活动的各领域,教育概莫能外。在教育领域,教育善恶问题是教育价值的核心,是教育伦理研究的主要对象。教育历来以教人为善自居,然而什么样的教育才是善的、好的教育是教育伦理学探索的真谛,也是教育伦理实践产生积极效益和效能的根本问题,是教育存在的本体价值所在。20世纪日本曾出现过军国主义教育,德国和意大利在搞法西斯教育,尽管至今也有少数人在为之辩护,但在教育正义的立场上,它们不是什么好的教育。作为一种恶的教育,它带给人类的灾难和负效益是发人深省

的。时至今日,现代教育对教育善恶的省察还是不够的,对现代教育善恶标准的意识和确立的边界尚不明晰,以至于在今天的教育中仍存在多种多样的违背教育善的思想和行为。如教育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合法权益的保障问题,不同地区和阶层的公民受教育权的平等问题,教育管理中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假集体主义的危害问题等,有的表现得十分复杂,如教育动机与教育效果、教育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教育价值的个体与社会本位问题等^[8]。诸如此类的一系列现象表明,教育善恶的矛盾不仅普遍存在并需要加以讨论解决,而且它极大地制约了教育伦理实践效益的发展。如果教育忽视自觉的道德追求和约束,就会导致“学校繁荣、教育衰败”的奇怪现象。因此,教育恶的存在启示人们,确立教育崇善的道德价值追求和约束是教育伦理实践产生理想效益的必要保证。

所谓教育崇善就是教育应该自觉提倡、建立和促进教育善,这种教育善蕴涵了社会对教育应有的价值期待,集中体现了教育伦理精神的时代精华。教育应追求积极进步的教育道德理想,努力使自身成为道德的事业。这种教育道德理想旨在将教育的人本理念与为社会服务的精神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促进人的整体素质和创造能力的提高,同时为社会提供更好更多的文化产品 and 精神财富,就此而言,大学不仅是弘扬文明、传承文化的场所,更是造就“完人”、推动知识更新、道德进化和理论创新的摇篮。因此自觉追求和有效促进个体的全面自由发展进而推动社会文明的整体进步应成为当今教育的伦理准则。正如叶澜教授总结传统教育价值取向偏差时指出:“在政府的教育决策中历来只强调教育的社会工具价值,忽视了教育在培养个性、使人的潜能得到尽可能发展方面的价值,总是要求教育出现即时的、显形的功效,忽视或者轻视教育的长期效益。”^[9]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教育价值主体已经由共同体逐步转向教育个体,教育伦理行为主体也从个体发展到社会,伦理价值追求已经从个体善度向社会善^[10]。这就要求我们转换思考问题的方式,运用体现时代精神的科学的教育善恶标准去评判教育的制度、法规和运行机制,对关涉教育的各类要素进行伦理考量,使教育改革朝着改善教育道德状况、有益于人的发展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健康前行。

其次,增加教育的物质投入,为优化教育伦理实践效益改善硬环境。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所取得的一切成果都是建立于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优化教育伦理实践效益离不开雄厚的物质基础的支持,撇开物质条件的改善而谋求教育伦理实践效益的提高无异于玄学家的坐而论道。教育伦理精神总是植根于一定的社会存在,经济利益制约着道德行为的发生,现代道德文明水平的提高总体上是伴随着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进行的。离开了正当的经济收入,师德的提高也就难以落实和持久,现实生活中教育行为的逐利现象是受利益驱动的显证。而入学机会的均等、教育公平的推进和教育质量的提升更需要必要的教育资源和物质条件为支撑。由于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人们之间贫富存在差距,落实教育公正问题日益突出。这一切都说明,教育善的真正达成,离不开社会经济实力的增强,需

要对教育加大物质投入,来切实维护教育之道德效益实现的物质基础和利益机制。

再次,加强教育伦理规范建设,为优化教育伦理实践效益提供德行基础。教育伦理规范体系作为行为主体的价值导向和行为规范,是以个体德性的自我完善和社会良风美俗的形成成为自身合乎逻辑的结果,直接关涉到教育伦理实践的效益实现。教育伦理是对先进的教育道德理想的自觉追求和实践,需要蕴涵教育价值的教育伦理规范的支持。加强教育伦理规范体系的建设不仅为教育者提出了正确的价值理念和价值判断,而且为优化教育伦理的实践效益提供了行为保证。教育伦理学从实质上而言,就是昭示教育者行为之“应当”以及如何使其行为契合“应当”的价值科学。在传统教育伦理学研究中,教育道德主要是作为人们行为的规范体系而存在的。在现代社会,教育伦理学研究不仅应注重发挥教育道德的规范功能,而且应当注重发挥教育伦理的激励功能,探求其激励机制。

教育伦理规范体系也为优化教育伦理实践效益提供了伦理制度资源。教育伦理规范要逐步地通过制度化形式辅助教育道德的实施,这是由教育道德实践的不完善性和制度的自身特征促成的。教育伦理规则的要求带有倡导性和建议性,在社会秩序体系不稳固和人们觉悟水平不平衡甚至低下的社会环境下,教育伦理的劝导性就会缺乏感召力而表现出乏力性。并且道德教化对人们品行的形塑常常是一种主体的内化过程,一旦教育道德不能很好地被个体内化所接受,其作用状况就很难显现。教育伦理规范对人们行为调控功能的有限性,决定了当教育伦理的效能不尽人意时,有必要将这种道德上的要求上升为制度或法律的要求,以保证社会对教育者的基本道德要求以及正常的教育伦理秩序由期望变为现实。诚如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所说:“那些被视为社会交往的基本必要的道德正义原则,在一切社会中都赋予了具有强大力量的强制性质。这些道德原则约束力的增强,是通过将它们转化为法律规则而实现的。”^[11]笔者认为,这种教育伦

理制度化建设,一方面,应将教育伦理中具有对等关系的权利和义务纳入法律制度体系之中,以保证受教育权利受法律保护,义务受法律约束;另一方面,应当努力创建现代教育伦理制度,尤其应将教育以人为本、教育民主、教育公正、教育正义以制度化形式来体现落实,并建立教育伦理运作的制度评价体系,确保教育善有“法”可依,教育事业获得健康而可持续发展。如此,教育伦理的实践效益方能得到切实的提高和理想的实现。

参考文献:

- [1][苏]苏霍姆林斯基.关于教育伦理的一封信[J].教育研究, 1983(8):80.
-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02.
- [3]罗国杰.伦理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96-97.
- [4]钱民辉.教育处在危机中,变革势在必行[J].教育学(人大复印资料),2001,(4):20.
- [5][英]艾略特.T·S·艾略特诗选[M].查良铮等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112.
- [6]夏正江.教育理论哲学基础的反思[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251.
- [7][英]斯宾塞.教育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43.
- [8]钱焕琦.教育就是善的吗[J].教育探索,2001,(2):33.
- [9]叶澜.试论当代中国教育价值取向之偏差[J].教育研究, 1989,(8):28.
- [10]糜海波.论教育伦理学的个体善与社会善[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8,(7):1.
- [11][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361.

作者单位:南京森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系,江苏南京 邮编 210046

Reflections on the Benefits of Practising Educational Ethics and Optimization of It

MI Hai-bo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Senlin Public Security College)

Abstract: As a sort of spirit of educational practice, the influence of educational ethics on the educational activities hasn't received enough attention from people. We think about the benefits of practising educational ethics aiming at its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value objective to the actual effect. Currently, the separation between the ideal pursuit and the actual facts in terms of the educational ethics mainly manifests itself in such aspects as the prevalence of utilitarian and elitist education as well as the decrease of humanist education. So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the moral law of education advocating goodness, increase the material input of education,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standardized educational ethics, and optimize and boost the practical profits, so that education will develop more automatically from the actual morality to the must morality.

Key words: educational ethics; practical benefits; reflection; optimization; goodness of education